

1949—1967

建国以来文化部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纪要

（初 稿）

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印

一 九 六 七 年

1949—1967

建 国 以 来 文 化 部
兩 条 道 路、兩 条 路 綫 斗 爭 紀 要

(初 稿)

文 化 部 机 关 革 命 战 斗 組 織 联 絡 站
毛 泽 东 思 想 战 斗 团 捍 卫 毛 泽 东 思 想 战 斗 队 編 印

一 九 六 七 年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

*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

前 言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思想文化戰綫上的階級鬥爭。

在我國新民主主義時期，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對文化戰綫上兩條路綫鬥爭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統的历史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以後，毛主席又發表了《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兩篇著作，這是我國和國際革命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历史經驗的最新的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新發展。

毛主席的這些著作，系統地論述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新文化，制定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路綫和具體方針政策，確定了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服務。這是我們黨領導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

但是，以陸定一、周揚、夏衍為首的文藝界一小撮黨內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長時期以來，却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綫，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綫。

在三十年代，他們提倡“國防文學”，打擊無產階級左翼文藝運動的伟大旗手魯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們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唱對台戲。

建國以來，他們對我們無產階級文藝界專了十幾年的政。

陸定一、周揚及其一伙，在政治上，他們是被推翻了的的地主資產階級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的代表；在思想上，他們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大雜燴；在組織上，他們是以三十年代投降主義文藝路綫的代表人物為核心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

追本溯源，這條文藝黑綫的總毒根，就是我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就是劉鄧黑司令部。

建國以來文化部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的鬥爭，是黨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鬥爭。

第 一 部 分

全国解放不久，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展开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斗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我党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指示：全国胜利后，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跳出来大唱反调，他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妄图扭转前进的历史车轮。

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写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在这一著作中，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七月二日至十九日，第一次文代会。毛主席亲临会场并讲话。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讲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讲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熟悉工农兵。可是周扬却在会上大肆宣传和毛主席文艺方向相对抗的言论。

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为戏曲改革写的题词：“推陈出新”，为戏曲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指出方向。

同一时期，刘少奇却在天津大肆放毒，说“《四郎探母》可演，鼓吹‘对书报、戏剧、电影审查尺度要放宽。’”

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 and 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九五〇年，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

刊，是配合反动統治階級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

三月，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着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謂历史題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階級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蔣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場的反动文人。他曾經編輯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資產階級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黃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統治階級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說过：《清宫秘史》，有人說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揚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等，以及背后支持他們的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却頑固地坚持資產階級反动立場，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說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員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几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揚、胡乔木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們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們却抬出了他們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話，說：“刘少奇同志認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議，义正詞严地駁斥了他們这种反动的、荒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們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們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資產階級在文艺思想战綫上一場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們活生生地扼杀了。

但是，欠賬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今后的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們的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們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須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拉下馬。

六月六日，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濟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争》的报告。指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爱国的知識分子为人民服务。”

六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作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指示。全国知识界掀起了思想改造运动。

第二部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这一次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猖狂进攻给予有力的反击。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发布关于实施土地改革法命令。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继全面展开。

十二月，由周扬支持并贷款的私营制片公司，在夏衍主持下，大毒草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经过周扬审定，公开放映。武训，是一个封建势力的奴才。清朝末年，他在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根本不去触动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封建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但是，电影《武训传》却把他写成“伟大人物”，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狂热地宣传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这个影片受到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和支持。

一九五一年二月，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了。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主席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号召大家起而斗争。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经过毛主席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

八月八日，在《武训历史调查记》所提出的铁的事实面前，周扬改换了策略，换了

一付面孔，发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这篇文章旨在捞取政治资本，并掩护这株大毒草的制作者，压制别人的批评，以篡改毛主席的基本论断，对抗毛主席所指出的投降主义，妄图减轻罪责。文章还隐晦曲折地以“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首先就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修正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论断。

八月二十六日，经周扬授意并批准的夏衍关于《武训传》的假检讨在《人民日报》刊出。夏衍把自己罪行说成是“认识问题”。

九月，在旧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同志对周扬等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抗拒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出尖锐的批评。周扬不满江青同志，竟说“工作难做”。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出版，第三卷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出版。这是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十月，刘少奇为了砍掉毛主席多年来提倡的革命文工团，不许它进入社会主义文艺阵地，发出了所谓整编文工团的黑指示。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委党组副书记胡乔木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为其主子效劳。在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和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先后详尽传达了刘少奇的黑指示：“文工团要整编、人员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文工团员很年青，大部分让他们转业，……不要这样混下去了。”

十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十一月十二日，胡乔木主持召开文委委务会议，讨论周扬等拟定的压缩文工团编制的方案和文工团试行企业化的办法。会后，由于当时控制文工团编制人数的反革命集团的大头目彭真对人数卡得又死又严，于是许多在革命战争中经过考验的文工团员不得不被迫改行转业。就这样，毛主席一贯重视并提倡的、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活跃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工团（队），就在“压缩编制”的名义下，被刘少奇、彭真、胡乔木、周扬等人扼杀了！大、中城市的文工团，也在“企业化”的名义下，被取消了。他们热心经营的是不下乡、不下厂、不下连队，常年上演洋人戏、古人戏、死人戏的大剧团、大剧院。

同年，胡乔木公然反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的指示，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在中宣部说这种提法“太简单”。他说：“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文艺不为资产阶级，例如我们的电影还要让他们看，还要教育他们。”这种论调正是反动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的所谓理论根据，胡乔木千方百计地为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中争夺地盘，要我们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文艺。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扬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他反对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与思想改造，鼓吹“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合作”。

同月，胡乔木借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的機會，授意林默涵寫《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鬥爭》。這篇文章，打着“紅旗”反紅旗，說是要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實際則特別強調反對“公式化、概念化”，以貴族老爺式的態度，對社會主義的新文艺橫加挑剔和斥責，給它們戴上“庸俗地理解為政治服務”、“標語口號化”、“粗制濫造”，“反現實主義”、“反歷史主義”等等大帽子。胡乔木利用他所竊據的職權，把這篇文章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強加給全黨，嚴重地挫傷了文艺新生力量的勞動熱情。

九月二十六日，《天津日報》發表毛主席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指出我國文艺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之陳，出社會主義之新的方向。

十月六日，舊文化部舉辦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周揚、田漢、張光年等竭力吹捧鬼戲、才子佳人戲，揮舞“反對粗暴干涉”的大棒，反對戲曲革命。

十二月，周揚在蘇聯文學雜誌《紅旗》十二月號發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把叛徒肖洛霍夫歌頌反革命分子的小說《靜靜的頓河》以及《被開墾的處女地》等捧為“中國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學習的范例，而且是作為共產主義教育和鼓舞廣大中國人民的強大精神力量。”

同年，劉少奇為查禁一批壞書而大發雷霆，說什麼“查禁一本書，就等於槍斃一個人，誰給你們權力查禁圖書的？”

劉少奇在審查“中國青年文工團”出國演出節目時，勃然大怒，說：“以後可以改成歌舞團，不然的話，就不批准你們出國！”此後，這個團就改為“中央歌舞團”，大搞輕歌曼舞。過年的時候，劉少奇把這個團的演員叫到家里跳舞助興。

一九五三年四月七日，周揚在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作總結報告。布署削弱黨的領導，加強“藝委會”領導。

九月三月，周揚背着中央召開第二次文代大會。二十四日，周揚在会上作了《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鬥》的報告。他為《武訓傳》批判“糾偏”。他聲色俱厲地說：“自電影《武訓傳》批判以後，我們的批評工作中發生了一些偏向”，“應當加以糾正”。他在文章中大反文艺服從政治，反對黨對文艺工作的領導，竭力鼓吹文艺事業自由化。他號召“努力學習蘇聯文學藝術事業的先進經驗”，提出要“運用社會方式領導藝術創作的活動”，強調“應當更多地依靠作家、藝術家自己的團體”來組織他們的“創作”，完全仿照蘇聯的一套來改組各協會。在這前後，蘇聯的東西搬了過來，文化部請來了蘇聯顧問，派出學生去蘇留學取經。於是，原來在文化工作中奪取領導地位的三十年代“權威”，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進一步合流了。

同月，胡乔木代表中宣部寫的在第二次文代會上的報告草稿中，公然對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提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不講文艺戰綫的思想鬥爭，不鼓勵新創作，反而以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為名，給社會主義新創作大潑冷水。胡乔木以無數的刻薄的咒語，侮蔑和嘲笑我們年青的社會主義新文艺，完全是十足的資產階級反動貴族的腔調。胡乔木的這個報告草稿，不折不扣地是一個綱領性的修正主義黑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陳伯達同志批駁了這個報告草稿，決定撤銷這個報告。但胡乔木野心不死，在

文代会快要结束时仍然到大会上作了发言，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把原报告草稿中的基本内容讲了出去。这是胡乔木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的罪行，令人发指！

十月，毛主席在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一九五三年，胡乔木猖狂地反对作家同工农兵群众结合。这一年胡乔木把反党分子刘白羽调到作家协会，面授机宜，利用住在大城市的“现有条件”，“找三轮车夫、小学教师、五花八门（各种人）来谈”，“谈天”、“交朋友”，贩卖“到处是生活”的谬论。他还恶毒地说：如果“有目的”地接近工农兵，就是“象媒妁之言的未婚夫妇，见了面都是有准备的”一样。他荒谬绝伦地提倡什么“一个作家固定同社会上十几个家庭往来，同时，一年中同一百人、一千人接触”，“观察几小时”，这就行了。

第三部分

对《〈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反动思想，全国展开了严肃的批判，驳倒批臭了胡适的形形色色的门徒，又一次赢得了大规模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重大胜利！

一九五四年，毛主席提出同资产阶级老爷、“权威”作斗争，反对党内的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权威”自居，包庇资产阶级专家，垄断学术，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并一致通过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包含着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他们会利用每一个机会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

七月，反革命分子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所谓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大肆攻击党的文艺方针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胡风在这个反革命纲领中，恶毒地把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为政治服务，说成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

九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烦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这本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同月开始，毛主席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作者俞平伯（北大教授），在这本书里，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烦琐考证的办法，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歪曲抹杀这本书的反对封建的积极意义。俞平伯的这套办法，完全继承了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的路线。胡适一贯反共反人民，两次担任国民党驻美国大使，一九一九年就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文章，

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想把我国青年引向脱离现实，避开阶级斗争的邪路上去。对于资产阶级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展开了严肃的批判。

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

以陆定一、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九月十五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九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十月，毛主席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驳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毛主席着重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

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却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撓“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毛主席尖銳批評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壓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對在《人民日報》轉載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為首的就包括劉少奇、周揚，也包括丁玲、馮雪峯支配的《文藝報》。

十月二十四日，周揚在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迫不及待地要人們去研究“包含複雜的內容”的所謂“學術思想上的問題”，開了一大批題目，要人們去搞煩瑣考證。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公開揭露了文藝界某些領導人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態度。周揚見勢不妙，馬上製造假檢討。

十二月八日，周揚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說什麼“放棄了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和鬥爭”，“是我們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我也就是犯了這種錯誤的。”他在發言中把這場批判唯心主義的鬥爭說成是為了“正確地繼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一切優良傳統”，“為《紅樓夢》真正科學的、客觀的研究掃清道路”，反對“貶低《紅樓夢》的客觀價值和《紅樓夢》不可知論。”對於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我們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他只說成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作風的突出表現”。他們還消極抵制，不發動群眾，不把鬥爭深入下去。

在這場鬥爭的後期，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對《文藝報》進行了改組。但是，換湯不換藥，《文藝報》仍然被周揚反黨集團把持着。

十二月，毛主席指示：批判胡適思想的文章要寫得通俗，並正面宣傳馬克思主義。胡適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我們寫文章也要有的放矢。

同月，蘇聯舉行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周揚代表中國作協在會上致“祝詞”。這個祝詞一字不提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党性原則，把蘇聯文學的成就，說成只是“繼承並發展了俄國古典文學的一切優良傳統”。把俄國古典文學吹捧為“在整個上一世紀世界文學歷史中達到了最高峯。”同時，吹捧“蘇聯的作家們總是光榮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綫。”

祝詞也沒有提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重大歷史意義，以及主席提出工農兵方向以來我國文學方面取得的成績。文中提到了一句毛主席的《講話》，僅僅是為了介紹毛主席對法捷耶夫的《毀滅》“給予了崇高的評價。”

同年，周揚看中了三十年代的老搭檔劉芝明，把他從東北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劉在文化部的七年里，積極推行周揚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綫，是帝王將相部的干將，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最為突出的是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主持召開的兩次全國劇目工作會議上，公開與毛主席唱對台戲，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

鼓吹鮮花与毒草自由竞赛，并用行政命令手段，大量开放鬼戏、坏戏，把大批牛鬼蛇神搬上舞台，任其自由泛滥，毒害人民，致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在戏曲事业中全面复辟。他就是毛主席严厉批评的“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的“共产党人”。

同年至一九五五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出版界掀起了一个取缔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运动。刘少奇急忙跳出来說：“要考虑当前资本主义还存在的问题（对坏書）如只没收，人家依然要搞。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和旁的工商业一样，采取包下来的方針。”他极力主张“新华書店可以搞合营，新华書店的基本建設可以削減掉，去搞合营。”企图讓资产阶级在“搞合营”、“包下来”的幌子下，鑽进国营出版社内部，繼續搞他的“长期合作”。

第 四 部 分

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联系着的，是更为复杂更为激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这场斗争给予反革命势力以严重打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五年一月，毛主席决定把胡风的反革命“意見書”公开发表，展开批判。毛主席还针对胡风在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掩盖退却，指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論、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絕不讓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批判。

一月七日，刘少奇百般包庇胡风反革命集团。周揚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一些会，根据政治原則对他們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周揚秉承主子的急旨，說：“解放以前的賬不算了，批評他解放以后的文章就可以了，”“（胡风的）反批評也要发表。”

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揚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罢了。早在一九五二年周揚、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謂“批判”胡风的座談会，在会上周揚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維克”。完全暴露周揚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是一致的。

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集全国代表會議。會議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关于高崗、饒漱石反党联盟的決議。粉碎高饒反党联盟，是我党“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

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人民日报〉連續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彻底粉碎了这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揭露出了一批胡风分子。

毛主席在为这些材料写的按語中尖銳地指出：胡风集团是一个反革命政治集团，“他們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軍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陣营的反革命派別，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統治为任务的。”他教导我們說：“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須鎮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达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毛主席的指示，是革命人民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个气势磅礴的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轟轟烈烈地展开了。

但是，周揚却竭力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打气。說虽与他們有分歧，但并不等于否認胡风等“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績。”說胡风等发表的一些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他們的一切正确的意見，我們都願意誠懇地接受”。他还吹捧胡风分子，說他們是“有才能而又努力的作家”，反对对他們的批判。

林默涵也吹捧胡风，說什么他“在政治上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是有貢獻的。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錯誤的。”

他們这些黑錢人物，对毛主席所领导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采取阳奉阴违、乘机捞一把的态度，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綫的代表，实际上他們后来所繼續提倡的，还是胡风那一套。

陆定一、周揚以后还歪曲这个斗争，說把思想斗争变成政治斗争，搞了个肃反，思想問題都沒有解决。

从一九五五年到五六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全党反右傾，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被迫接受公私合营。资产阶级說自己上了“賊船”，他們极不甘心。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自以为还有同无产阶级进行較量的本錢，他們受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变逆流的鼓舞，跃跃欲試。

六月十日，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再一次強調“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論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再一次严肃批評“口称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視批判唯心論这一斗争”的那些人。

十一月，周揚写了一篇〈紀念〈草叶集〉和〈堂·吉訶德〉〉的文章。周揚公开反对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而他却針鋒相对地狂热鼓吹堂·吉訶德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則，他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关于丁、陈反党投敌以及解放后組織小集团繼續反党的罪行已彻底揭露，但是，陆定一、周揚还尽力包庇这些叛徒、反党分子。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撰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序言，指出：农村

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到来，其它经济部门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必须扩大和加快，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必须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并指出：乡村里每日每时都发生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每个人都应当关心它。

九月二日，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〇四篇文章写了按语，热情歌颂了五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严厉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

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作了总结。他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其一伙提出的“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口号，和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过去几年，我们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胜利：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这四个方面的胜利，都带有反资产阶级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以后还要给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对唯心论要继续长期地搞。

同年，刘少奇在讲话中反对取缔黄色和反动的书刊，说“取缔黄色书刊，应该有代替，要根据有益无害销得掉的原则，大量印旧书，旧书中有害的不要删，可加按语批评。”

同年，刘少奇伸向文艺界的一只黑手胡乔木给报纸下了一道通令：“引用毛主席的话或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呼”，他竟然宣称，如果尊称毛主席，强调了毛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那么，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就“好象是领袖提出来的，不得不接受。”还下令“主席的话不要用‘教导’、‘指示’等词”。胡乔木猖狂反对毛主席，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由来已久。他还曾借“歌功颂德”之名，反对广大群众歌颂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七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扬在开幕式上作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一如既往地吹嘘“五四”传统，以提高“三十年代”文艺的地位，说什么“今天的文艺工作者都是由这个传统阶段抚育出来的”，把毛主席提出的工农兵方向曲解为“应当最广泛地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服务”，攻击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公式主义”。

周扬竭力曲解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还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观的指示，篡改说“在现代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的条件下，有才能的、忠实于现实的作家、艺术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和生活实践走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三月，文化部举办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周扬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首先吹嘘

欧阳予倩、田汉等所搞的话剧运动，說在1930年以前就和无产阶级結合了。接着攻击解放区的戏剧，說由于“习惯于长期間的用它作为宣传鼓动”，“也带来了弱点。”周揚还疯狂地反对戏剧中的人物表示对毛主席的感恩戴德。說什么“如何感謝共产党，如何感謝毛主席，这話少講一些，这話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他恶毒地表示怀疑，老百姓在一年三百六十天中是否“整天总講这几句話”。他叫囂：第一“这就是不真实，尽管这个話也講过”；第二“都是感謝共产党、毛主席”的話，就“不能表現性格特点”。他还大肆宣揚“統治者中間也有好人，皇帝中有好皇帝，资产阶級革命时也出現好人”，販賣资产阶級的“人性論”和“投降主义”。他还誣蔑无产阶级缺乏文化、知識“就是野蛮主义。”

三月八日，刘少奇在文化部黑党組錢俊瑞等人汇报工作时，作了一番黑指示，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綫。他反对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宣揚资产阶級的“自由竞争”和物質刺激。他強調：民間职业剧团“該搞合作，而搞了国营，就是‘左’，就带有反动性”，他要“民間职业剧团再搞它二、三个五年計劃，讓它与国营剧团竞赛”。他叫囂：国营剧团“对待演員，好演員工資要高些，吃得好些；差一点的，工資可低一些。可以采取訂合同的办法”。他还提出：要讓流散艺人“到处跑跑”，“每年开它一、二次会”，开会时“玩它一天，把一年会費都花掉”，“要松散一些。”他还歪曲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抵制文艺革命，鼓吹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的艺术。他說：“我們的方針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要推掉一些陈的，但不能勉强。”改造文化“不要硬生孩子”“百花齐放允許并存”。他还說：“戏改不要大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攻击戏改犯“急性病”、“过分”、“过早”、“改的不象了”。別有用心地說什么“反映現代生活不能勉强，芭蕾舞、外国歌剧不一定能反映，即或能反映，也只有几个戏。”还說：“看《天鵝湖》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水平也很高，也有教育作用。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輕視，不能乱改。”甚至說外国电影“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他极力掩盖文艺战綫的阶级斗争，借口“整风”庇护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叫囂“抓錯、搞錯每个朝代都有”；“把思想問題与反革命問題混在一起，領導要負責任，大家也有責任”。还說：文艺需要整风，“主要是靠个人思想斗争，自己用心去写”“检查报告”。还說：这种做法“要控制严些，不要登报，不要向外公开。”他煽动創作人員反对党的領導，鼓吹资产阶級“創作自由”；对領導同志意見“可以不听”。甚至攻击党的領導是“外行”。他还要文化干部照他的办法去“提高修养”。刘少奇的这套黑指示，是他在文化艺术領域內复辟資本主义的总綱領。

第 五 部 分

我国经济战线上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大出笼大泛滥，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周扬一伙同资产阶级右派相互呼应。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这场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大肆鼓吹美国反动影片《居里夫人》是“进步的艺术”，“也会影响我们”；胡说什么“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个讲话，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

四月，美化资产阶级的反动电影剧本《不夜城》出笼（载1957年《收获》创刊号）。

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发表了伟大的划时代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发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

四月，全国戏曲剧目会议时期，对歌颂汉奸、宣扬活命哲学的反革命京剧《四郎探母》发生争论，周扬向刘少奇请示时，刘少奇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嘛！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

五月二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于这个无产阶级的坚定政策，被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歪曲和反对。

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抽去了“二百”方针的“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实质，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把提倡写工农兵、写新社会、写新生活说成是“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等等。在他这一讲话之后，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分子纷纷发表文章，照着陆定一的腔调大肆反对“二百”方针。

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作了重要谈话。毛主席指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

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必须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刘少奇在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